

迟发展效果与迟发展国家 现代化的制约条件

孙立平

“迟发展效果”是美国著名经济史学家格申克龙在研究德国和俄国的社会发展时提出的一种分析框架，他用这个概念来解释现代化起步较晚的国家在现代化进程中所面临的特殊条件及现代化的特殊性。

格申克龙认为，与英国这些早发展国家相比，日本和俄国这些国家由于社会发展和现代化在时间上起步较晚，其所面临的制约条件与早发展国家相比是很不相同的。这样，就形成了他们社会发展的不同特点。他说，就发展速度、工业的组织结构、国家和银行的作用而言，落后国家的工业化与先进国家的工业化过程相比较，是大不相同的。此外，先进国家与落后国家进行工业化的思想意识也是不同的。思想意识对象俄国和日本这样的后起工业国家的工业化起了重要作用。落后国家在工业化过程中往往不是采取自由放任的政策，而是用强有力的思想（往往是社会主义思想）来促进国家工业化。在此之后，对迟发展效果进行比较系统研究的是英国学者多尔。他的关于迟发展效果的理论主要是在研究英国、日本和发展中国家现代化的过程中形成的。此外，在美国哈佛大学拉美事务专家哥迈尼的著作中，也充满着关于迟发展效果的思想。哥迈尼以现代化的“先到者”（first comers）和“后来者”（late comers）为框架，把世界上的所有国家划分为六类（西方现代化的先到者，现代化的第二批到来者，西方的第三批到来者，非西方的文明先到者，非西方文明国家，现存的原始社会），然后逐一分析他们现代化的不同条件，以及他们在现代化中所各自面临的问题。

本身就处于迟发展国家，而又专注于迟发展效果研究的日本社会学家富永健一可说是一个典型代表。富永健一指出，后发展国家所面临的问题与先进国家是不同的，这一着眼点是“现代化理论”在考察西方先进国家之外的国家的现代化时所必须大力研究的。作为一个日本学者，富永健一的迟发展理论侧重于研究东方社会。他认为，东方的社会结构具有这样的一些特点：第一，东方诸国没有发生过科学革命，没有建立起系统的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缺乏支持和培养科学的国民基础；第二，帝王专制统治结束得比较晚，缺乏民主制度的深厚基础，而专制主义的影响根深蒂固；第三，不平等克服得比较晚，在今天的某些东方社会中不平等依然严重存在，而少数人拥有财富和文化是不可能导致工业化与现代化的；第四，由于传统的思想和文化的作用，缺乏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的国民主动性和积极性。^①这就设定了东方迟发展国家的现代化与西方现代化的截然不同的条件。

综合上述研究迟发展问题的学者的意见，我们可以概括地说，所谓迟发展效果，即是指

^① 杨继明：《富永健一的后发展社会理论》，见《光明日报》1986年1月29日。

现代化起步较晚的国家由于其起步晚所面临的与现代化起步较早国家不同的制约条件。比如，发展中国家在国际经济秩序中所处的不平等地位就是一种迟发展效果。多尔就认为，迟发展效果首先就表现在经济机会上的差别。这是因为，当发展中国家获得政治上的独立从而开始现代化进程的时候，西方发达国家占主导地位的国际经济秩序已经建立起来了，这样，迟发展国家就不得不在先发展国家的支配下发展经济。而且，发展中国家不能依靠掠夺和剥削殖民地来加速经济发展，相反，长期受剥削的历史对经济发展造成的消极影响却不是一下子就能够消除的。再比如，发展中国家在开始现代化时所面临的日益恶化的自然环境，也是一种迟发展效果。在早发展国家开始现代化的时候，它们几乎是用整个世界的资源来发展经济的，而且将工业化带来的污染物向整个世界排放；相反，当发展中国家开始现代化的时候，则不得不与先发展国家一同分享先发展国家造成的资源短缺、环境污染的恶果。但这里要指出的一点是，迟发展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概念并不完全相同。前者的范围要比后者更为广泛，迟发展国家既包括广大发展中国家，也包括发达国家中发展起步较晚的国家，如日本等。从最广泛的意义上说，它包括除欧洲工业、政治革命中诞生的第一批现代化国家之外的一切国家。

尽管迟发展效果理论也遭到了一些批评，但总起来说，它为我们分析不同国家、特别是现代化起步较晚的国家社会发展的条件、道路和特点提供了一种新的角度和视点，使我们可以从一个新的视点看到一些从其他视点所看不到的现象，使一些从其他角度得不到解释的现象得到解释。

下面我们就从迟发展国家的实际情况出发，结合我国现代化的具体实践，对几种主要的迟发展效果以及对现代化的影响进行概括的分析。

1. 迟发展国家社会结构的多元性及对现代化进程造成的抑制与震荡

作为现代化的先到者，西方早发展国家的现代化基本上是一种自然演进的过程。也就是说，它主要不是由于外部的挑战而“人为地”进行的，而是一种内生的过程。这样，在早发展国家的现代化过程中，在其发展的每一个具体阶段上，整个社会大体上是一种单一的结构。也就是说，在不同的地区、不同的部门，其发展呈现一种同步状态。而发展中国家作为现代化的后来者，其现代化基本上是为人为进行的，而且往往是在若干个地区、若干个部门首先开始，其他的地区和部门仍处于传统的、甚至是半原始状态。如果在特定的条件下，现代化的地区和部门与非现代化的地区和部门形成互相封闭甚至互相排斥状态，就会形成一种多元性的社会结构。这种多元性的社会结构会使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与社会发展呈现出一种早发展国家所未曾有过的复杂性。这样，能否有效地解决由于社会结构多元性所带来的种种问题，就成为后发展国家现代化能否成功的关键。

人们通常所说的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的“二元结构”，就是由迟发展效果而形成的社会结构多元化的典型表现形式。“二元结构”是指在一个国家中，城市中的现代社会与农村中的传统、半原始社会同时并存；一方面是与西方发达国家所差无几的大都市，另一方面则是贫困落后、闻不到一丝现代化气息的农村。这种“二元结构”的实质，是后发展国家中现代性结构与传统性结构因素的一种分裂。这与早发展国家现代化之初的情况很不一样。在早发展国家，从现代化伊始，农村与城市、农业与工业的发展就大体保持一种同步状态，城市经济中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与农业中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几乎同时成熟。在有的国家，农村中

的商业式的大农业制度的建立，甚至要早于大规模的工业化。这样，就在不同部门的发展之间，建立起一种协调关系。相反，迟发展国家的工业化往往不是自身经济成熟的结果，而是对来自早发展国家工业化的刺激和挑战所作出的一种回应。加上殖民主义统治所遗留下来的依附格局，迟发展国家的现代工业系统往往是与早发展国家的经济系统直接联系而不是与本国的传统生产部门直接联系。这就造成一种双重的恶果。一方面，工业化在国内缺乏其赖以发展的基础，另一方面，在广大的农村，落后的农业与工业的发展无法衔接，无法从工业部门那里寻得支持，农业生产的面貌难以得到根本的改变。

迟发展效果不仅造成“二元结构”这种结构性失调，而且使多种矛盾交织在一起，从而使迟发展国家的现代化与社会发展呈现出一种极为复杂的局面。在这当中，迟发展效果造成的结构多元性恐怕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托夫勒的三次浪潮理论认为，西方社会已经经历了两次浪潮，现在正在或即将进入第三次浪潮。如果套用这个概念，那么，中国处于哪一次浪潮？可以说，几乎哪一次浪潮都有。广大农村大部分处于第一次浪潮，大部分城市是处于第二次浪潮，有的地方甚至进入了第三次浪潮，如北京中关村的科学城。而在极个别的边疆地区，甚至连第一次浪潮也没有经历过。这种多元结构反映在群众的情绪上，就是一种多样性的要求：农村对温饱的要求、工人对改善生活和追求社会公正的要求、青年知识分子对个性解放和政治民主化的要求，所有这一切交织在一起。这与早发展国家的情况是很不一样的。在早发展国家，由于在每一个发展阶段上基本上都是一种单一的结构，社会成员对社会和国家的要求是比较单一而集中的：在匮乏阶段，是对物质财富的呼唤；在物质财富充裕以后，是对精神需求和个性解放的呼唤。从这些国家文学发展的道路上也可以看到这些踪迹：在人们看不到用自己的努力满足自己欲求的希望时，产生的是浪漫主义；当人们可以用自己的努力满足自己的欲求的时候，发现了社会的不公正，于是有批判现实主义的产生；随着社会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物质的匮乏得到基本克服，而精神需求的满足提到突出地位的时候，产生的是现代派文学，如荒诞派、黑色幽默、存在主义等。但在特定的发展阶段，都有大致相同的文学表现。相反，在一个多元性结构的迟发展国家，文学与文化也表现出一种多元化。如在我国，农村的封建迷信和口头文学、工人的通俗文学和为知识分子所欣赏的现代派文学同时共存。

多元性的社会结构以及由此造成的人民群众的多样化要求，是迟发展国家现代化过程中的一个重要制约条件。一般地说，在特定的发展阶段，政府只能集中精力解决某一个方面的问题，这就很容易造成对某些少数群体的要求的忽视。因此，迟发展国家的政府和领导人，必须对不同群体的不同要求进行妥善的协调，否则就会造成社会的动荡。我国近几年来部分社会群体发生的情绪波动就提醒我们必须对这个问题给予足够的重视。当然，这个问题如解决得好，也会利用先进的结构因素的拉动作用，从而加快现代化的进程。

2. 社会各个部门发展的不平衡，从而造成整个社会发展的不协调

迟发展国家社会发展的不协调，集中表现在其深层结构与表层结构变化的不适应上。

对一个社会的结构，大体可以从物质层面、制度层面、观念文化层面来划分。而在社会发展的过程中，这三个层面的变化速度并不是很一致的。其中，以物质层面的变化速度为最快，制度层面次之，而观念文化层面的变化最为缓慢。在社会学与人类学中，我们通常将这种现象称之为文化堕距（culture lag），美国人类学家奥格本认为，这种堕距现象可以拖延很久。

如前所述,迟发展国家的现代化和社会发展,并不是一种内生的自然演化过程,而是在外部因素的影响下人为地进行的。从区域结构的角度看,往往是从某一区域首先开始的,从而造成地区之间发展的不平衡。从社会结构的角度看,则表现为这种现代化和社会发展往往是首先开始于物质层面,开始于生产中的技术与设备。事实表明,在一个国家摆脱了外来的压迫,而致力于自己的发展的时候,往往都是把工业化放到一个首要的地位,通常的做法是大量引进国外先进的技术与设备。但在物质技术上得到武器的同时,其制度与观念文化的层面却没有发生相应的变化,这样,就产生了社会发展中的不平衡和不协调现象。

在制度层面上,值得注意的起码有如下一些因素。第一,在政治制度上的独裁专制与缺乏社会动员的力量。许多发展中国家独立以后都曾模仿西方的政治模式建立了民主政体,但由于种种条件,这些民主政体往往都缺乏坚实的基础。结果,没有很长时间,这些民主政权便纷纷倒台,而代之以军人独裁。但无论是脆弱的民主政治还是军人独裁,往往都缺乏动员社会中的各种资源,以进行社会发展和现代化的力量。第二,在分层制度方面,封闭性的分层系统往往是迟发展国家的共同特征。这种封闭性的分层系统既抑制了为社会发展所必需的社会流动,也窒息了人们的创造性和进取精神。第三,特殊的人际关系准则使现代的组织原则与管理原则缺乏运行的基础,从而使现代的组织结构与管理结构难以建立。第四,家庭在社会生活中占有一个极其重要的地位,家庭关系的准则支配着其他的社会关系。

在观念文化的层面上,表现为传统的文化和社会意识、社会心理与经济、社会发展的要求不相适应。在60年代和70年代,英克尔斯、斯密、勒纳等一批美国社会学家曾对第三世界的现代化过程进行过许多研究,他们认为,在发展中国家,个人现代化的程度较低,传统的思想方式和行为方式支配着人们的生活,这是造成第三世界国家现代化不顺利的重要原因。1978年在西柏林召开的“东南亚文化和工业化”国际会议,也集中讨论了传统文化对于工业化的阻碍作用。尽管在这些讨论中西方学者往往是从西方文化特有的标准出发,带有明显的文化种族中心主义的色彩,但传统文化对第三世界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阻碍作用确实是不容忽视的。思维的非理性特点,使人们不习惯于用科学的态度来对待生活,对科学技术的接受与传播缺乏应有的心理准备;在血缘关系基础上形成的血缘和宗族观念,也使人们难以接受现代的组织管理原则;安于现状的心理和封闭性的狭隘视野,使人们在生存竞争中缺少动力;传统的时间观念和价值理想,在新的生活节奏和生活内容面前产生种种不适应状态。特别是根深蒂固的宗教观念,对这些传统的文化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所有这一切,都成为一个社会发展的无形而强大的阻力。

3. 示范效应会使迟发展国家的政府和领导人承受巨大压力

在迟发展国家现代化的进程中,来自早发展国家的示范效应也是一个重要的制约因素。

示范效应首先表现在物质消费上。近年来我国经济建设中出现的一个引人注目的问题就是消费基金的膨胀。这种情况在1984年底、1985年初达到高峰。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可能是多方面的,比如政策的失误以及其他一些偶然因素等。但如果仔细进行考察,就不难发现这里还有更深一层的原因。事实上,“消费早熟”的现象并不仅仅在我们国家存在,在东欧国家的改革中以及在许多发展中国家里同样存在这种现象。为什么这么多的国家都会发生同样的政策失误?根本原因就在于:在这些政策失误的后面,有一个共同的因素在起作用,这就是西方的早发展国家对迟发展国家的“示范效应”。

所谓“示范效应”(The demonstration effect),按照迪尔森贝利(J·Duesenberry)的说法,是指消费者不是仅根据自己的收入进行消费和储蓄,而是按照他与之进行接触的更高水平的消费进行消费和储蓄。^①这里只要比较一下早发展国家与迟发展国家在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相同时遇到的不同消费环境就可以看清其中的原因。比如,美国在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只有300多美元的时候,不仅没有彩电、电冰箱、空调器,就连黑白电视机和普通收录机也没有。但当我们这样一个迟发展国家达到人均国民生产总值300美元的时候,不但有了彩电,还出现了录音机,还有各种多功能、高性能的收录机、激光唱机、组合音响等。早发展国家的这些先进的消费品,必然会对迟发展国家人民的消费欲望产生影响,从而刺激出超越现有生产力发展水平的消费欲望,并导致现实行为上的“消费早熟”或“消费超前”。以我国情况为例,1984年我国的人均国民收入只有人民币579元(相当于英国开始工业化时的水平),而城市职工家庭中电视机、电风扇、录音机等耐用消费品的普及率已达到日本人均国民收入1000美元(约合3000多元人民币)时的水平。由此可见,迟发展国家中的消费行为,不仅取决于本国的经济发展水平,而且也受来自早发展国家的消费上的“示范效应”的左右,这就在迟发展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中造成一种不协调、不平衡。

作为一种从外部施加的影响,“示范效应”会对迟发展国家的现代化和社会发展进程产生一系列的不利影响。这主要表现在:(1)造成经济发展中的社会总供给与社会总需求的不平衡。许多发展经济学家都指出,社会剩余*的比例低以及被浪费,是造成发展中国家经济停滞的一个重要原因。而社会剩余的比例低则与“消费超前”有直接关系。(2)刺激起过高的消费期望,增加对政府的压力。一般地说,一个国家经济与社会发展的起步越晚,其与早发展国家的消费水准差距越大,公民对政府的期望也就越高。这样就为迟发展国家的发展增添了一个不容忽视的制约条件,这就是迟发展国家的政府承受着一种巨大的压力。而当他们实施某项社会发展的重大措施,如社会改革、社会规划时,为了取得民众的支持,往往是许诺过多,以迎合民众的情绪。而这些措施本身又常常达不到所许诺的十全十美的效果。这就使得这些发展措施不得不从一开始就承受极大的风险。(3)加剧社会的不平等。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第三世界国家社会发展中存在的一个问题就是两极分化、社会不平等日趋严重。可以说,目前发展中国家社会不平等的程度已经远远超过西方发达国家。^②当然,造成社会不平等的根本原因并不是“示范效应”,但“示范效应”却可以加剧社会不平等并使其表面化。事实是,即使是在世界上最贫困的国家,其上等阶层的消费水平完全可以同西方发达国家中的上等阶层相媲美,因为他们可以通过对外贸易直接获得发达国家的最先进的消费品。也就是说,他们的消费水平并不取决于本国经济发展的水平,而是取决于发达国家消费品的生产水平。比如,尽管本国还没有汽车制造业,他们却可以乘坐上在西方也算最先进的汽车。相反,其下等阶层的生活水平却要依赖于本国的经济发展水平,与发达国家下等阶层的生产水平相比要低得多。这种巨大的、表面化的不平等,往往是社会动乱的起因。

在这里特别要指出的是,“示范效应”并不仅仅是表现在消费领域,而且也表现在社会生活的其他方面。多尔就认为,“示范效应”也可以表现为:富国中产阶级的某些主张、愿望和追求会迅速向迟发展国家传播,如对环境的关心、人权思想及国家要为保证公民享有起

① G·Germani:《现代化的社会学》(英文版),第150页。

* 社会剩余这个概念是指总产量中减去必要的消费以后剩下的部分。

② 具体情况见拙文《论社会协调发展的两个层面》,《社会学研究》,1986年第2期。

码的福利而发挥应有的作用的思想。哥迈尼也认为,可以把“示范效应”推演到一个更广大的范围,即可以把这个概念应用到除消费和经济行为以外的社会结构的各个方面:如物质和非物质文化的形成,社会组织的形式,在全球社会中的参预程度,人际关系,特别是会影响到老百姓的具体生活。

4. 迟发展国家现代化的人为性质,决定了其领导机构和领导人的极端重要性

只要将迟发展国家的现代化与早发展国家的现代化进行一下比较,就可以发现一个明显的差异,这就是:迟发展国家的现代化起始时间比较明确,而且其起始点往往与某一次变革、某一届政府、甚至某一个领导人直接相联系,如俄国的彼得改革和彼得,日本的明治维新与明治天皇;相反,在早发展国家的现代化进程中则很难看到这一点。其原因就在于,早发展国家的现代化是一个自发的累进过程,而迟发展国家的现代化则是一个人为的陡变过程。这样,迟发展国家现代化的一个必不可少的条件就是“促进现代化的精英身居中央担任领导”。^①只有这样,才能自上而下地推进工业化、现代化;也只有这样,才能有效排除反抗现代化的传统社会力量。因此,能否形成这一条件,将决定着迟发展国家现代化的成败。对于这一点,日本的富永健一曾对日本和中国的现代化进行了比较,他认为,“在日本,当时主持明治政府的大久保利通、伊藤博文和山县有朋、井上馨等人与同样身居明治政府的西乡盛隆、江藤新平等旧武士代表势力的传统主义相抗衡,推进着日本的产业化。相反,辛亥革命后的中国,即中华民国,却是军阀割据和激烈的内部混战,袁世凯和段祺瑞等人身居中央权力政府之要职却没有任何产业化和现代化的意识,这是中国的致命点。虽然初期的中华民国推选孙中山为临时大总统,但孙中山以清朝皇帝的退位为条件将总统职务让与了袁世凯。从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一文中可以看出,孙中山在当时几乎是唯一的具有西方现代思想的领导者。但是,他始终只是一个软弱的革命运动家,未能成为一个促成中国社会内部产业化、现代化之稳定趋势的领导者。因此,中华民国时代的中国没有出现如同日本的明治政府那样强有力的领导现代化运动的政权,由此产生了近代革命后的中国与明治维新后的日本的重重大差别。”^②

这就决定了迟发展国家现代化的另一个特点,就是必须进行根本的政治变革,甚至要首先进行这种变革。英国这样的国家可以在封建王权的统治下开始不断积聚现代化的因素,而迟发展国家却很难做到这一点。

5. 学历化社会与迟发展效果

多尔在迟发展效果的理论中总结了一条规律:发展起步越晚,学历就越广泛地作为职业选择的手段;持有文凭的人就越多,学校就更加注意考试而牺牲真正的教育。其原因在于,在早发展国家的发展初期,许多科学技术还很不成形,而在迟发展国家开始发展的时候,这些科学技术大多已经系统化、学科化了。因此,许多迟发展国家在普及教育过程中,必然要重视正规教育,重视文凭,可以说,文凭病、学历化社会这在迟发展国家中是一个普遍存在的现象。日本就是一个突出的例子。在日本工业化初期,学历就主宰了职业选择权,而在发

① [日]富永健一:《现代化理论与中国社会的现代化》,见《国外社会科学》,1986年第10期,严立贤译。

② [日]富永健一:《现代化理论与中国社会的现代化》,见《国外社会科学》,1986年第10期,严立贤译。

展中国家，这个问题就更为突出。正象有人指出的：在决定谁能得到一份理想的、收入较高的工作时，能力和才干不是按工作熟练程度或者与工作有关的专门测验的成绩来衡量，而仅仅是简单取决于一个人通过了多少次考试，以及他一共得了多少分。这种按考试成绩进行排队的制度造成了许多弊病。

在发展中国家，由于要追求学历，几乎所有的初级教育的结构都是为了使能够最终通过考试。因而，每一级教育都是不完整的，都是为下一个学业阶段做准备，而不是为实际生活和工作做准备。^①但绝大多数人很难进入更高阶段的学习。

同时，出现了另外一个现象，即受过教育的、拥有文凭的人大量增加，但其中很多人却找不到工作。这些人本来是为现代化部门培养的。但由于这些现代化部门能提供的就业机会很有限，致使有文凭的人失业率大增。

6. 发展中国家在国际经济秩序中所处的不利地位

在五六十年代，许多发展中国家从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的压迫下解放出来之后，就试图加入到国际秩序中去，以开始自己的现代化进程。但从加入国际秩序那一天起，发展中国家就在国际秩序中处于一种不利地位。这集中表现在他们在国际分工中的不利地位。

在国际经济秩序中，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分工可以称之为“垂直型分工”。这种分工主要表现为国际间农矿业和制造业的分工。西方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关系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建立在这种分工之上。这种不平等国际分工大致形成于19世纪，那时，英国是“世界工厂”，其他国家则成为英国的商品销售市场和原料食品的供应地。

发展中国家现代化的另一个不利国际环境因素表现为，在他们现代化起步时，种种自然条件，特别是资源条件严重恶化了。资源和能源是任何国家现代化、特别是工业化不可或缺的条件。由于发达国家是现代化的先来者，当他们进行工业化的时候，广大发展中国家，或是处于殖民地、半殖民地状态，或是处于落后的农业经济阶段，他们是用整个世界的能源和资源实现少数几个国家的经济发展的。他们或是通过直接的殖民掠夺，或是通过间接的不平等贸易，获得大量廉价的原材料和能源。比如在70年代以前，发展中国家的石油就是以一美元左右一桶的价格廉价出售给发达国家。而美国则以占世界6%的人口，使用着占世界每年能源消耗量的40%来实现自己的经济发展的。

7. “迟发展效果”与“落后优势”

我们曾经说过，早发展国家由于是现代化的最早到来者，技术上的一切都要自己来创造。多尔认为，发展起步越晚，传统技术和进口技术之间的差距就越大，迟发展国家越是可以引进先进的进口技术，而无须重复实验过程来发明新的技术。日本就是一个突出的例子。据有人进行统计，在1955~1970年间，日本几乎掌握了世界半个世纪中发明的全部技术。他们引进这些技术花了大约60亿美元，但如果这些技术全由自己发明，大约需要2000亿美元。而且，不但节约了1000多亿美元的资金，还赢得了30年的时间。

但多尔同时也认为，依靠进口技术同时也有许多不利之处。比如先进技术节省人力，耗

^① [英]保罗·哈里森：《第三世界》，第361~363页。

费资金，这就对就业和外汇问题产生不良影响。同时，在早发展国家发展初期不曾有过的某些先进技术，如今在人均收入很低的迟发展国家推广，医疗技术和通讯技术就是这方面的例子，这些技术对发展并非总是产生好的影响，采用这些技术使人口激增，政治不安定，从而阻碍了发展。

在这方面特别引起人们注意的是外债和人口爆炸两个方面。

据估计，在60年代末期，为了引进西方的技术，发展中国家大约每年要花去15亿美元的外汇，在1980年大约在90亿美元左右。因此，相当一批发展中国家为引进技术而负债累累。特别是在一批所谓新兴工业化国家，如美洲的巴西、智利、阿根廷、墨西哥等。同时，在引进这些技术时，还有许多的附加规定，如引进一方必须向供应一方购买原材料和零件，并不得出口用这种技术生产的产品。这就使发展中国家在国际贸易中处于一种不利的地位。

再看人口。人口爆炸是目前发展中国家普遍面临的一个令人头疼的问题，本身就已经成为发展中国家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严重障碍。据大约的估计，在目前被称为第三世界的国家，在本世纪初人口刚刚超过10亿；60年以后，增加到20亿；在1977年，又超过30亿。可见，人口的增长越来越快。其原因从根本上来说固然在于人口出生率很高，但从直接的原因来说，则不是由于出生率太高，而是由于死亡率太低。而造成的死亡率降低的直接原因就是大量引进西方的卫生和医疗技术。这种状况在早发展国家却不曾出现过。日本的小仓满雄认为，人口统计学家一般把人口发展分为三个阶段：(1)高出生率、高死亡率阶段；(2)高出生率、低死亡率阶段；(3)低出生率、低死亡率阶段。工业化国家现在处于第三个阶段，而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则处于第二个阶段。他认为，工业化国家的人口发展从一个阶段到另一个阶段所用的时间长得多，由于各方面条件的具备，而发展到另一个阶段，使人口发展呈现一种平衡状态。而发展中国家可能在其他方面的社会条件方面目前还处于第一个阶段，但引进的技术使它进入第二个阶段，这就造成人口发展的不平衡。

作者工作单位：北京大学社会学系

责任编辑：严立贤

征 文 启 事

由《社会学研究》杂志社、浙江省社会科学院和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发展理论与中国的现代化”课题组联合举办的“迟发展国家的社会问题”学术研讨会定于1988年8月在浙江镇海召开，拟通过征文确定与会者，欢迎大家踊跃投稿。来稿请寄：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严立贤收。截稿日期6月底。

“迟发展国家的社会问题”会议筹稿组

1988年5月